



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

田玉隆 田泽 胡冬梅/等著

丛书主编: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贵州土司史

GUIZHOUTUSISHI

上册

GUIZHOUTUSISHI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

田玉隆 田泽 胡冬梅/等著

丛书主编: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贵州土司史

GUIZHOUTUSISHI

上册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

王朝文題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王良范 李建军

副 主 编:徐之明 吉志义 辛 维

编辑委员会:王良范 李建军 徐之明

吉志义 辛 维 罗晓明

罗宏伟

贵州土司史简介

贵州全省“皆土司”，在全国很有代表性，还未引起史学界重视。贵州省府州县都是在改土归流时建立的。

贵州土司史，予贵州土司作了通纂，并对土司制度兴衰史，土司机构建置，土官对土地占有，土官世袭制度，土司社会的农工商业、阶级关系，典章制度，军事战争，监狱刑罚，文化教育，民族；中央政府对土官的政策，贵州土官对中央政府提供赋税、徭役和派兵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贵州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在贵州发展壮大，贵州土官从分疆割据到如何进入全国大一统；明清的改土归流，迄民国末年，贵州仍有土司残余等问题，《贵州土司史》都作了深入探讨。贵州四大土官，田杨宋三家是苗族，由是全书约五分之一篇章是叙述苗族。

贵州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关于土司问题的专著，该著作填补了这个空白。

作者简介

田玉隆，苗族，贵州松桃人，1937年12月生，1964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曾在贵州省档案馆等单位工作，后调贵州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1998年3月退休。先后自编讲义和讲授课程有中国民族史、贵州古代史、贵州近现代史、民俗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等。已出版《蚩尤研究资料选》编注（26万字），另发表论文10多篇，约10万字。据家乘及老人讲，我田氏是思州田大土官后代，祖上在清雍正年间帮助鄂尔泰等官员建立松桃理苗同知，即今松桃县的前身。清朝世袭守备，到光绪8年不准再承袭，当了150多年守备。由是对土司问题感兴趣，花40余年编著《贵州土司史》，修定约60万字，获贵州大学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所资助，即将出版。

田泽，女，苗族，1979年生于贵阳，2001年7月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

胡冬梅，女，1971年生于贵阳，1995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至今，一直在贵阳二十六中学执教，讲授初中历史课程，中学二级职称，曾经在《文化广角》发表过文章。最近又在《中华教师文库》中发表过《浅谈素质教育的一点体会》等论文。

丛书总序

今天，“全球化”在各种话语中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很明显，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全球化呈现出越演越烈的态势。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及相关的诸多规则日益成为一个普世的行为标准；而另一方面，超国家超地域的游戏规则则日益成为国际市场交往中人们实现自己利益的制度。这种趋势即使是在地方性的社会和社区中也已经深受感染。有人推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文化的全球化也将不可避免。然而历史是辩证的，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人们却开始越来越关注和重视独具个性的地方性文化的保存与彰显问题。地方性文化因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当市场经济的行为拓展到那些远离中心的边缘的地区，人们发现地方性的文化恰恰可以成为极有开发意义的社会资源。用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的话来说，它们乃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操作下转换出极有商品价值的经济效能。而其最显效益的地方，则突出地体现在旅游观光事业方面。在这一领域中，那些极富民族个性和地方特色的文化凭借着自身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而独放异彩，因而也就成为不可替代的资源优势。由此，即便仅仅从功利的目的上来说，人们也意识到保护地方性的文化实际上是有长远利益和战略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性与全球性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

此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文化也是一个呈现多样性的生态结构，因为它实际上显示出人类在生存上同复杂、丰富、多样

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另一方面,从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也是需要文化的多样性的。这不仅仅是出于审美上的需要,而且也是生存上的需要。所以,保护和传承各种地方性文化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筹划编辑这套地方性文化与文化记忆丛书,目的也算是迎合当今人们对地方性传统文化的保护与重视这一观念。这套丛书定位在贵州的“地方性文化及文化记忆”等文化事相的描述与研究上。而说到贵州的地方性文化,其中有诸多的内容自然就会涉及到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

贵州是一个主要由移民形成的省份。自古而今,这里就接纳过多次的大迁徙移民。在贵州的十八个世居民族中,绝大多数民族(苗、侗、布依、汉、彝、土家、瑶、水族等)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就是从它乡移民贵州的。由于贵州的地理条件的复杂,使得定居到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各自相对保持了自己族群支系或社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这种情况延续久了,便形成了五花八门而又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由此,也就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地方性的文化遗产。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并没有严格的体例和学科专门化要求。大凡同黔境各族居民有关系的语言、历史、民族志、文化志、神话、传说、文化经典,等等,皆可以纳入到本丛书的阵容中来。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贵州各地方的少数民族在接纳现代性的过程中,这些地方性文化也是其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粮。因此,无论是从保护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性的文化都是值得人们高度重视的。

程亦赤

2006 年春

关于贵州史和贵州民族史 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代序

你了解贵州版图形成和贵州省来源吗？请看《贵州土司史》，它将给你满意回答。

土司，元明清诸王朝地方政权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制度；土官，少数民族自然领袖，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吏，有职无俸，世代占有土地人民。土司制度实质上是少数民族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典章等制度，与历代中央王朝官制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政体，对少数民族所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适应。从宋末开始，延续民国末年，在华南和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约七百年。

贵州土司制度，在全国很有代表性，解剖贵州土司制度，不仅可以窥见国内外土司制度的全貌，而且还可以了解到贵州版图的形成和贵州省的来源。

土司史，是个复杂问题。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说：“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我在这里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充分占有史料基础上，试图解剖贵州土司社会。

首先必须说明几个问题。

一、被颠倒的历史必须把它再颠倒过来

我在学习贵州各民族历史过程中,觉得有许多问题被封建文人弄颠倒了,创造历史的主人,被诬为“贼”,而真正的贼被当作正人君子歌颂。贵州各族祖先,千百年来被荆斩棘,用自己的智能和血汗开发了贵州高原,使她变得美丽富饶。诸如贵州坝子和梯田的开辟,是各族人民战天斗地智慧的结晶;丹砂又名朱砂,古代产地主要在黔东,那里古代是苗侗等放聚居区,黔东丹砂发现和早期生产当是苗土等族先民;驰各中外“大定漆”,则是彝族先民的贡献;独山的盐酸,是布依族人民发明;玉屏侗族的箫笛、仁怀的茅台酒,等等。贵州各族祖先用辛勤劳动创造出光辉绚丽的贵州古代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贵州人民的丰功伟绩,却被封建文人一笔抹杀,各族民众被斥为“顽冥不化苗蛮”,不劳而食并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则被歌颂,这样就颠倒了历史。我们有责任把被封建文人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贵州民族古代为什么有众多称呼

元明,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各族人民在反封建斗争中,给封建统治者毁灭性打击。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们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对贵州等少数民族实施“以蛮夷治蛮夷”的政策,如把贵州古民族分成几十上百种,郭子章《黔记·诸夷》和清代《百苗图》等。这些民族称谓有许多带有侮辱性的,犹“九股恶苗”,辱骂彝族为“罗鬼”等;有许多称呼是封建统治者人

为地把一个民族分成若干称呼。其目的在于破坏各族内部团结,挑拨民族关系,鼓励同一民族中持不同称呼的各部份互相敌对,制造同一民族内部或各民族之间隔阂与残杀,从而达到削弱以至消灭各族反抗力量,维护封建王朝统治。这就是贵州古代民族称谓众多的历史原因,封建统治阶级可丑目的应予戮穿,以资加强民族内部和各族之间友好与团结。消灭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与隔阂,使各族共同为建设贵州而奋斗,这项任务至今仍很艰巨。

三、元以来“苗”成了南方少数民族泛称

元朝以来,苗族的族名逐渐成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历史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苗族元明反封建斗争特别勇猛,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久,地域之广大,给封建王朝打击之深重等,都居南方各族之首。封建统治者对付苗等族起义特别感到头痛,他们疾呼顿首不暇之际,就不加区别地把中国南方民族,包括部份汉族,统统称为“苗”。第二,元明到清初,苗族分布相当宽广,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古三苗暂不说,元末苗族首领杨完者和陈友谅从两湖带去“苗兵”不下十余万⁽¹⁾,这两部“苗兵”后来就在当地定居下来。明代抗击倭寇的卫国战争,曾从湖南调去许多“土兵”,其中苗族不少并定居下来⁽²⁾。沿长江两岸,西到云南,南到海南岛,各省区都有苗族,特别是从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广西和云南的苗族基本相连,并有较大聚居区。第三,隋唐以来,湘黔川的苗族分别在思州田氏、贵阳宋氏和播州杨氏“大首领”统率下,逐渐建立以苗族为主包括各族社会组织的地方政权——羁縻制——土司制。这样,苗族和其他族便有了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逐步巩固发展苗等各族文化特

征。苗等各族在田杨宋三家大土官率领下，东征西伐，并抵制了彝族为主建立的南诏国奴隶主东侵，又为隋唐宋元王朝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田杨宋利用苗等各族力量统一湘黔川桂部分地区，为唐宋元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唐宋元王朝就把这些地区予田杨宋占领。以“苗”为基本力量的田杨宋土官势力强大，如郭子章《黔记》说：“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元明人因之得以把“苗”代替南方少数民族，苗族的族名逐渐成了南方少数民族泛称。

“苗”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始于元，盛行明清，终于民国。为节省篇幅，在拙著中往往以“苗”的泛称来代替少数民族一词。从明清史籍看，明清政府把贵州的少数民族分作两部分：接受官府“编民”纳粮当差者，称为“熟苗”；远居深山，没有被官府“编民”，不承担赋役，称为“生苗”。“生苗”、“熟苗”，不能简单视为一个民族，今天的苗、布、侗、水等少数民族中都有“生苗”、“熟苗”。为尊重历史，保留历史本来面目，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用“苗”、“蛮”等泛称。拙著中为了把泛称的“苗”与苗族专称区别开来，涉及今天苗族，都用现代名词——苗族，用引号的“苗”、“苗民”、“苗人”、“生苗”、“熟苗”等都是泛称，把泛称的“苗”都视作苗族，既不符合历史又是错的。

四、民族识别

研究民族史，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对古代民族进行识别。历史原因，直到解放初期，许多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成份有待识别。所以民族识别是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服务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工作。根据解放以来我国民族识别经验，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聚居或杂居的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成份识别，主要的根据：一是科学依据；

二是民族意愿。

古代民族不是都发展成今天民族，同一民族的人也不完全发展成今天的民族。古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有分裂出去，又有同化进来，共同组成新的民族，即民族同化。民族发展过程，即民族的同化与分裂过程，这是进步的，合符社会发展规律的。汉民族的吴越、两湖、两广等方言就是民族同化后留下的历史痕迹，笔者和其它同志发现福建与广东交界特别是以梅县为中心的客家话，与苗语松桃话相比较有 30% 左右是相同的，闽、粤交界的部份汉族也如苗瑶畲信仰“盘瓠”，上述情况是汉族发展过程中同化有其它民族的例证。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也和汉族一样或多或少同化有其它民族，这就是一个民族内部有许多方言土语原因之一。

古民族识别是民族史研究中首先碰到的问题，古民族识别既要见到各民族的共性，也要见到各民族的特殊性，一个民族从古到今必有其特征，即民族学上的心理素质。构成民族特征主要是民族的政治和经济，语言和历史，古今习俗，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疾病丧葬，饮食居住，服式颜色，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它属于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而演变，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迄民国末年仍然保留浓厚封建主义因素。贵州尤为突出，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对封建文化及习俗破坏不大，封建的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仍占统治地位，所以生产力发展相当缓慢。即使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还要顽固地延长很久才消失。所以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各民族古代的特征，这就为我们研究民族史和民族识别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

大家知道，今天的民族都是由古民族发展成，某个民族的特征则是古民族特征的继承和发展，作为独立民族则有自己的特征，是其它民族所没有。只有掌握了各民族的特征，才能准确识

别古民族与今天民族关系，民族识别中才不公式化或张冠李戴。

民族识别还要注意历史上专称和泛称，切忌偏见和牵强附会，不能把南方民族不分历史时期不分地域统统冠在一个民族头上，这就违背了历史。我国地大人多族众、历史悠久，就长江流域以南，现在有二、三十个民族，其先民自古交错杂居，这就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古民族在称谓上具有专称和泛称性质。例如蛮、夷、濮、僚、苗、越等古民族，就分别发展成今天南方各民族，都可说是今天南方民族的共同祖先，这就是古民族的泛称性。而“苗”又是今天苗族的专称，元明清至民国，又是南方民族的泛称。我们在研究古民族时注意了民族的专称和泛称之后，再借助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对古民族进行识别，考证哪些古民族主要发展成今天某个民族。这个民族识别是件细致复杂的研究工作，不能笼而统之，只见一族，忽略他族，只见大族强族，不见小族弱族。民族史研究中，也要防止大民族主义，民族不分强弱大小，都要给予适当历史位置，这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相邻或居住在一起的民族就不会视而不见，也不会犯穿凿附会毛病。

民族研究如果局限于单个民族，就缺乏邻近民族情况作比较，容易被复杂的民族关系弄得头昏脑胀，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我认为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主，同时把周围的民族也一块研究，这样就有比较余地，便于系统地识别古民族与今天民族关系，以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有比较同无比较的单个民族研究容易看清楚问题。

五、土司制度既是中央王朝地方政权组织又是少数民族社会制度

“土官”一词产生很早,《礼·月令》载季夏之月,“其神后主”,注“后主,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土官。”“土司”一词,始于何时待考,《明史》始有土司传,《清史稿》仍有土司传。从明清史籍考之,土司与土官有区别,把两者混称,是一种误解。

土司制度的特点是以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和土府、土州、土县等名称出现,既是中央王朝地方政权组织,又是少数民族社会组织;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为主要官员,既是中央王朝地方官吏,又是少数民族自然领袖。元朝各级土官职权极大,如贵州的土官兼有军民两政权力,多属武职土官,都掌握有“土兵”等武装,改土归流后土官才丧失武装而变成文职,最后消失了⁽³⁾。

凡建立土司的地区,都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部份,土司的建立和土官的任职,必须奉朝命。所以中国的土司制度,应是这段时间里中国封建制度的组成部份,因之土司史应是中国通史组成部份。遗憾是中国通史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太薄弱了,希望有志之士补上。

全国土司地区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并不一致,有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处于奴隶社会,有处于封建农奴社会。贵州土司社会里的民族,基本处于封建农奴制度,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还有其它自由民。农奴和奴隶们被禁锢在土官或封建领主的土地上,社会地位低下,生活非常痛苦。

我们研究贵州土司建置沿革,以今天贵州省的地理疆域为准,历史上曾属贵州土官所辖的长官司等,划定省界后而划属他省,不在本篇之内研究而从略。

六、关于贵州各民族社会历史分期

贵州境内各民族,都有悠久历史,各民族形成及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比较复杂,由篇幅所限,这些问题放在其它地方讨论。宋元,贵州各民族基本封建化,都是在封建领主制下生活。明永乐,贵州改土归流建省,贵州地区才迅速出现封建地主经济,贵州各民族也随之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

七、关于研究贵州史及贵州民族史的史料问题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里说“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大发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地要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在大部份的民族里还有黑邦的和教权的文化)——并不仅是‘成份’而已,而是统治的文化”(4)。列宁的这段话为我们研究整理文化典籍拨开了迷雾,即要看到文化典籍的积极面,也要看到文化典籍的消极面。

贵州从秦汉迄清中叶,少数民族多汉族少,研究贵州史离不开少数民族史。贵州史和贵州民族史的史料有两方面来源:

第一是汉文字史料,并且是主要的。我国各族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典籍,为我们研究各民族古代社会提供了丰富资料。如历代官书《史记》等,类书《太平御览》等,地方志《贵州图经新志》等,封建文人个人著述《炎徼记闻》等。由于阶级偏见,关于贵州各族古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法律道德诸方面偶有记载,非

常破碎。大量材料是记载各族人民反封建王朝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封建王朝对各族大镇压大屠杀。因之许多材料带有侮辱性，或颠倒黑白，或含混不清，这就迫使我们从事民族史或贵州史研究的人对古代留下的文化典籍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研究整理。

解放后，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第二是存留民间的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歌谣等。贵州少数民族中，除彝族有文字记载本族及邻族历史文化等，水族《水书》不在民间流传仅是巫师用占卜。《苗族简史》介绍，英国传教士坡拉德（汉名柏格里）和苗族杨雅名、张武、李斯提等人用拉丁字母和符号，以威宁石门坎苗语为标准音，创造拼音的“坡拉字母苗文”，曾在川滇黔部份苗族中流行。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以凯里旁海苗语为标准音，用教育部民国七年公布注意字母创制“注意字母苗文”。清末民初，湘西苗族石板塘借用汉字偏旁，创造方块字苗文。抗日战争时期，吉首苗族石启贵用阿拉伯字母，以吉首市苗语为基础，创造速记苗文。松桃苗族龙绍华用国际音标编苗文课本。创造苗文的先贤们，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些苗文都未能在苗族中广泛流传，未被广大苗族运用。侗、布等族古代有无文字，待考。这些少数民族文字，都未系统整理出来供史学界研究用。

明清屡见苗等族有刻木纪事，但是这些木刻实物已不多见，更谈不上有较多木刻实物提供研究用。民间存留的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歌谣等资料极为丰富，可补充古代文献的不足，我们应该充分

注释

- (1)陶宗仪《南封轶耕录》卷8,苗志;据调查,城步等地苗族族谱中记载杨完者事迹很详,现在城步等地苗族仍把杨完者等人事迹传为美谈;《明史》卷123、133、方国珍传、胡大海传。所引《二十四史》均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 (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世宗实录》卷315、435、499,凡引《明实录》同。
- (3)郭子章《黔记》卷56,土司土官世传,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本,下同。
- (4)中央民族学院编《列宁论民族问题》89页。